

東亞日本研究的新視野—— 第四屆「東亞日本研究論壇」會議實錄

徐興慶*



▲ 第四屆「東亞日本研究論壇」大會會場照片。

一、背景說明

「東亞日本研究論壇」(East Asia Forum for Japanese Studies) 由韓國日本學會發起，並由日本國際交流基金(Japan Foundation)協辦，第一屆在韓國濟州島召開(2010.12.4-5)、第二屆在日本仙台(2011.12.8)、第三屆在中國北京

* 國立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兼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舉行（2012.11.3），參加者有韓、日、中、臺產官學界之專家。第四屆「東亞日本研究論壇」（2013.12.7-8）又回到韓國釜山舉辦，此次以「東亞日本研究的相互協助與合作」為議題，除韓、日、中、臺學者參加以外，擴大邀請俄國、蒙古的日本研究學者計 27 名與會。討論的範圍橫跨東亞的歷史、思想、文學、語言、國際政治、國際經濟等領域，分（1）東亞日本研究的方向與展望；（2）東亞的國際合作；（3）東亞日本研究的可能性；（4）國際共同研究的現況與展望等四個主題，主要在建立各國日本研究的橫向聯繫、交換資訊，並構築人文及社會科學的對話機制。大會在韓國日本學會會長權赫建先生、日本國際交流基金田口榮治理事致詞後，揭開序幕。

二、論壇專題演講

（一）勝海舟の中国観

——「脱亞入歐」ではないアジア観の代表——

（演講者：上垣外憲一，前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大妻女子大學教授，東京大學文學博士）

日本將福澤諭吉（1835-1901）的「脱亞論」（1885）作為明治日本的指導理念，又在日幣最高面額的一萬圓印上福澤諭吉的肖像。對此，上垣外教授表示他有很大的疑惑，認為日本在戰後，長時間在一萬圓紙幣置入聖德太子（574-622）的肖像，因為他在外交政策上促進中日、日本與朝鮮半島的百濟、新羅之間的友好關係。而福澤諭吉有諸多反東亞、反中華文化圈的言詞，因此認為在一萬圓紙幣印上福澤諭吉的肖像是有問題的。相對於福澤諭吉的脱亞情結，幕末、明治期的政治家勝海舟（1823-1899）在甲午戰後仍堅持中日之間必須持續友好的外交關係。上垣外教授指出：勝海舟從 1862 年擔任德川幕府的「軍艦奉行」以來，終其一生都堅持東亞三國必須連結，以對抗西洋列強，是一位真實的東亞同盟論者。勝海舟與德川幕末熊本藩出身的思想家橫井小楠（1809-1869）都是和平主義的倡議者，他們以儒教的道義、仁義為基準，以

理想主義為主軸提倡和平主義。勝海舟也繼承橫井小楠的國家經營論，認為除了日本必須「國富」之外，中日兩國必須共同合作，促進東亞的經濟繁榮，因此，甲午戰爭在道義上、在經濟繁榮上都違反了勝海舟的和平理念。

上垣外教授認為勝海舟的思想與現今日本和平憲法的理念一致。昔日福澤諭吉在朝鮮的親日派政變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失敗之後，以一貫的姿態輕視清朝，贊同甲午戰爭，全面肯定日本的勝利。而勝海舟一向批評甲午戰爭是「無名之師」，雖然阻止不了戰爭的發生，但他的和平思想才是現今日本的指導原則，呼籲大家重視勝海舟百餘年前就洞視中、韓兩國會再興起的慧眼。

（二）東アジアを創る日本研究に向けて

（演講者：李鍾元，前立教大學副校長、早稻田大學韓國研究所所長，東京大學法學博士）

本場演講主要說明「區域研究」(area studies)是自十九世紀以降，由歐美各國向非歐美國家衍生，以政策研究為導向的產物；二次大戰中及戰後的冷戰時期，以美國為中心，作為「區域研究」的學問領域，加速了它的體系化及普及化。二十世紀，冷戰結束及全球化帶給國際社會嶄新的變化，導致傳統的「區域研究」面臨重大的挑戰，主要的原因有三點：（1）語言的特殊性之低迷；（2）因方法論的挑戰，「區域研究」傾向細分化；（3）因高度資訊化的社會，知識、資訊急速大眾化，「區域研究」的專業性受到新的挑戰。為了因應上述的新趨勢，李鍾元提議三點因應對策：（1）擴大摸索從「區域研究」到「廣域研究」(region studies)，因為全球化時代的區域研究課題，都呈現複合、多元的傾向；（2）摸索人文與社會科學的融合（連結），以展開新的學際合作研究；（3）非限定「區域研究」，針對「協議民主主義」¹及「參加民主主義」的議論中，重新思考「專家」與「知識分子」所扮演的功能及其意義。

最近，「區域研究」的「專家」發言力在結構上有逐步下滑的趨勢，因為東亞區域內的相互認知呈現「片斷化」的現象，而且日益顯著。如何將綜合的、多元的知識經驗提供大家分享，尋求理解，進而謀求解決之道，成為今後東亞

¹ 「協議民主主義」的概念出現於1990年代，意指政治決定非在政治的場合協議，而是必須經過市民社會協議而背書的概念。

區域研究的重要課題。特別是東亞地區現在面臨歷史性的轉換期，各國在歷史認識、領土問題方面的「區域認知」(area identity) 依然薄弱，導致互不信任，對立加深，這種因民族主義的衝突而產生對立(escalation)致無法解決的情況，是令人擔心的事實。但東亞各國在社會、文化、經濟方面，作為一個「區域」已逐漸形成，因此大家更需要關注他國社會結構變動的事實，以了解東亞各國的多樣性社會所呈現的複雜問題，發揮東亞的日本研究、區域研究的功能，進而對東亞的區域形成(region building)作出貢獻。

三、論壇主題

(一) 東亞日本研究的現況與展望

第一場次由筆者擔任主持人，日本國際文化研究中心荒木浩教授、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郭連友教授、韓國漢陽大學李康民教授擔任評論人。



◀ 徐興慶先生(左)主持第一場論壇；發表者為韓國首爾大學日本研究所所長朴詰熙教授(右)。

首先，韓國首爾大學日本研究所所長朴詰熙以〈韓國日本研究的現況與課題〉為題發表演說。他從過去不幸的日韓歷史經驗，論述韓國人至今仍對日本存有「否定的情感」，韓國的日本研究以語言或文學領域為主，約佔全體的 70% 左右，社會科學的日本研究則稍嫌薄弱。但為產業發展及經濟成長，韓國的企業仍然積極汲取日本的技術與機器，而作為國際區域研究的日本學則起於 1990 年代中期。提及韓國人因過去被日本殖民的經驗，普遍存在著「懂日文即

了解日本」的幻想，且過分自信無須對日本作體系性的研究，因此韓國並未創出深入研究日本的社會環境。第二代的日本研究學者以留學美國者居多，而直接對日本作實證研究的是第三代的日本研究學者，他們研究日本是因為 1980 年代日本經濟的崛起，研究者的年齡層以 50 至 60 歲者居多。2000 年之後，既存的日本研究科系及相關學會，不升反降，顯示韓國的日本研究有衰退的現象。

近幾年，韓國政府及韓國研究財團制度化的支持人文學與區域研究，使日本研究的機構在質、量方面產生很大的變化。在促進「HK (Humanity Korea) 事業」的發展制度之下，首爾大學、高麗大學、國民大學再度興起了日本研究的熱潮，每個學校的研究內容皆具其特殊性，逐步向多領域的人才培育及人文與社會科學對話的目標邁進。未來韓國的日本研究不會僅侷限在學問上的探討，也希望在對日政策上提出建言，此與目前日韓關係緊張有關聯性，今後國立外交院、世宗研究所、東北亞歷史財團等研究機關都會透過論壇的方式，舉辦與日本相關的政策辯論會，作為戰略性的日本研究之新方向。此外，朴所長也提議大家共同思考未來日本研究「東亞統合」及國際共同研究的相關問題。

東京大學川島真教授以〈東亞的歷史研究之方向與展望〉為題，論述東亞的歷史研究如何展開、歷史資料的數位化及其公開、歷史領域的共同研究、社會、媒體與歷史學者、過去的反省與歷史教育及日本研究中的歷史研究等相關問題。主要說明東亞各國歷史研究的多樣性，涵蓋中、日、臺之間最難研究的政治、外交的歷史研究；全球化歷史演變的人與物的研究及現代史、冷戰史的研究等「東亞史」都有新的嘗試，「中國的崛起」、戰爭、殖民地支配及脫殖民地化，將是未來「東亞史」研究必須關注的焦點。又，「東亞史」研究即使有「超越國境」的趨勢，但各國的「國家」意識依然存在，其間反映了主、客觀及自我與他者的複雜問題，因此歷史認識的問題，無論在「國際」或「國內」都會頻繁地發生。對此，川島教授呼籲中日、日韓政府及民間促進各種共同研究，以逐步化解彼此之間的歧見與對立。

此外，從發展日本研究的角度而言，日文系研究生有必要培養政治學、法律學、經濟學的專業素養，特別是歷史學的專業是最有可能培養成功的領域，因此實證性的歷史學在外國史研究的過程當中，它成為一種可以平衡的歷史學，同時在歷史言說的形成上，也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俄國日本研究者協會會長、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大學 Dmitri Streltsov 教授在〈俄國的日本研究現況與展望〉的報告中指出，俄國的日本研究機構，分別

附屬在東洋學研究所（1818）、遠東研究所及世界經濟國際關係研究所等三個單位。東洋學研究所的研究人員約有 500 名，現為世界規模最大的東洋學研究機構。該中心主要以研究日本歷史、文學、語言學為主，其他兩個日本研究中心則以研究現代日本政治、經濟及外交為主。此外，在各大學中，從日本的古典到政治、外交的研究也頗為興盛。

俄國日本研究者協會，成立於 1994 年，為目前俄國規模最大的學會組織，也是歐洲日本研究者聯盟（EAJS）的集團成員，內分日本文化、藝術、文學、語言學、歷史學、宗教學、政治學、國際關係、經濟學、社會學等領域，各組成員約 50-60 名。該學會的功能，旨在促進各個研究機構與俄國聯邦的各大學的資訊交換、與日本國際交流基金共同主辦各種主題會議、徵文比賽（歷史、政治、經濟、語言）及研究成果的出版。該協會在過去五年曾經舉辦「現階段的日俄關係」、「亞太區域的日本」、「政權交替後的日本」、「日俄堆積如山的政治及社會問題」、「摸索新全球化的日本角色」等國際會議。出版《日本》年鑑（1972 年創刊），至今已有 42 年的歷史，屬於核心期刊，刊載日本經濟、歷史、文化、社會、政治等重要資訊。此外，俄國日本研究者協會也執行諸多研究計畫，最近啟動了「日俄關係百年史」、「日俄歷史學家會議」，2014 年將以俄語、日語、英語三種語言出版《日俄百年史》專書。

蒙古國立大學 T. Munkhtsetseg 教授在報告中說明，蒙古於 1973 年成立東洋學研究所，主要在翻譯與日本相關的資料。1999 年東洋學研究所改名為國際學研究所，才開始有研究日本學的部門，至 2000 年左右有了「日蒙關係史」的研究成果。蒙古國立大學、其他科技大學、教育大學的日本研究主要是推動日語教育的人才培育。2007 年，蒙古七所大學的日本研究者成立了「日本學會」，目的在推動日蒙關係、比較文化研究，未來將注重於日蒙兩國經濟發展的研究。

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主任徐一平教授則報告中國各大學設置日本研究所的現況，以及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的未來展望。提及中國曾經對日本研究機構作過兩次大規模的調查，至 2010 年為止全國共有 48 所日本研究機構，出版了《中國的日本研究》（1997）、《中國的日本研究》（2010）兩冊報告書，指出各校日本研究機構均同時發展教育與研究，特別注重語學教育及專業教育的均衡發展；說明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未來在教育方面，將以提升人才培育、修改課程、充實博士課程內容為目標；在研究方面，則深化中日的相互理解及產學合作的連結，從客觀及科學的角度提供社會經濟政策的建言。在圖書與資訊傳達

方面，將確立作為圖書館學術資訊中心的功能，建構各領域的文庫並促進利用。在國際共同合作方面，促進政府部門及各大學的日本研究機構與海外研究機構結合，並促進中日企業之間的連結。

（二）東亞的國際合作

第二場次由韓國秀林文化財團理事、日本國士館大學申景皓教授擔任主持人，韓國《國民日報》解說員趙榮來教授、中國國際廣播局總編輯室副主任傅穎女士、日本帝京大學池村俊郎教授、韓國首爾大學朴喆熙教授擔任評論人。韓國國立外交學院曹良鉉教授、日本慶應大學政治學科西野純也准教授同時指出，1990年代開始，東亞或亞太地區陸續成立了 ARF、EAS、APEC 等國際合作組織，2000年開始，東北亞（中日韓）積極摸索相關組織的合作問題，2008年之後各國的國際合作逐漸呈現具體的發展，至2012年為止，中日韓之間召開過18次的閣僚會議、50次以上的對話機制，並且通過100個以上的合作計畫，形成了政策聯絡網。但2013年之後，中日、日韓之間因歷史及領土問題，關係惡化的情勢逐漸浮出檯面，導致三國之間的首腦會議延宕，加上北朝鮮的核武發展及軍事挑釁等問題，給東亞局勢的穩定帶來負面的影響。

曹良鉉指出：面對中國的崛起，以美日為核心出現了「牽制中國」的對策，促使東亞區域合作演變成權力鬥爭及霸權競賽，反映出統合（integration）及牽制（hedging）的兩種結果。此外，就現今東亞多國間貿易合作而言，亞太地區推動區域內貿易及投資自由化，有愈演愈烈之勢，近年來，東南亞國協（ASEAN）已分別與中國大陸、韓國、日本、澳、紐及印度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並進一步整合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成為 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美國則主導「環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的形成。這些複數的組織架構，相互合作也相互競爭，構成了東亞的新區域主義。

西野純也指出：2013年2月新上任的韓國總統朴槿惠認為東亞各國在經濟方面的相互依賴雖然日益加深，但在政治、安保（國家安全）的相互合作卻出現停滯的情況，她將此現象稱為「Asia Paradoxa」，意指各國之間雖然在經貿、文化、教育的交流頻繁，但卻共同存在著政治、軍事、歷史、領土的問題，導致關係惡化。為了解決這些困境，她呼籲可以考慮先從氣候變遷、環境、災

害救援等非傳統的安保領域，協調合作的機制，再逐步恢復彼此的信賴關係。韓國若想在「東亞和平合作架構」中發揮朴槿惠政權的外交主導（initiative），即應積極扮演推動東亞國際合作的核心角色。朴槿惠總統認為歷史認知是最複雜的問題，此外，各國國內民族主義高漲、北朝鮮持續引發東亞和平危機以及中國軍事力量的大增等，都是非常棘手的問題。兩位發表者都建議中日韓三國應立即建立危機管理機制，以解決衝突事件的發生，同時中國也應在日韓兩國之間扮演區域安全的夥伴角色。

針對中日關係的現狀，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吳萬虹副教授述及：過去，日本提供鉅額的「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這不僅是對中國的恩惠，也促進了雙方的利益。中國的發展提供了日本市場與機會，帶來很大的利益。中日關係最重要的焦點在於相互依存，這種現象至今未曾消滅，且在維繫兩國的發展上是必要的。習近平政權最大的課題在內政以及維持經濟的持續成長，中國現在面臨環境、貧富差距、食品及腐敗等嚴重的問題，這些問題日本早在 20 世紀中期就已經驗過，今後中國必須向日本學習。中日之間雖然存在著競爭與對立的問題，但也存在「合則兩利」的現實面，今後當以「求同存異」的原則，增進東亞區域、經濟、安全保障的合作，改善中日關係，同時對東亞及亞太地區作出貢獻。

俄國遠東聯邦大學 Kovalchuk Marina 教授，以〈是新冷戰？或是健全的競爭？〉為題，提議創設歐亞大陸（Eurasia）聯盟、關稅同盟，以解決各國之間經濟、政治、軍事等複雜問題；指出東亞各國應以和平、融和、平衡為大原則，創造出健全競爭的新環境，他認為東亞不是只有中國，而是指在幾世紀以前以中國哲學的意識及心理認知（mentality）的多數國家。分析日本明治時期福澤諭吉的「脫亞論」一時蔚為風潮，但凡事仿效西歐的日本政治，雖然帶來不少成功，但也對周邊的諸多國家帶來莫大的悲哀，呼籲大家不要忘記這段慘痛的歷史教訓。希望俄國及日本都能回歸到亞洲，對比西歐的同時，重新建立融合的東洋世界觀。

（三）東亞日本研究的可能性

第三場次由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主任徐一平教授擔任主持人，東京大學川島真教授、韓國中央大學李在聖教授、東國大學金煥基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

吳萬虹副教授擔任評論人。這一場討論以東亞為視野，聚焦在印度、越南的日本古典文學研究、筆談與東亞文化交流，以及介紹臺灣的日本研究、韓國高麗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發展的可能性。

荒木浩教授的報告指出：現在東亞各國提倡世界文學，認識漢字（漢文）文化圈，進行對外交流史研究的同時，多冠上「東亞」的語彙，進行國際研究及國際學術研討會，其間陸續出現不少的研究成果。他以印度、越南的日本古典文學研究之可能性為題，探討日本古典文學受到佛教影響，從印度的角度分析《源氏物語》，從越南的角度，通過《舊唐書》、《新唐書》等史書及日本和歌的內容，分析日本遣唐使、唐朝政治家、詩人阿倍仲麻呂（698-770）在古代東亞的文化及文學交流的內涵，強調未來以東亞為視野，研究日本古典文學之可能性。南開大學劉雨珍教授主要介紹晚清駐日公使館何如璋、張斯桂、黃遵憲等外交官與明治期的日本文人、琉球交涉及朝鮮修信使金弘集等人筆談的相關資料及內容，從漢詩唱和、漢文添削及資訊傳播的面向，分析筆談資料在促進東亞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韓國高麗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俞在真副教授表示，該中心的發展目標在架構「日本研究的世界基地」（HK 事業計畫），其組織有國際交流教育院、資訊資料院、翻譯院等三院，研究領域分日本歷史、日本思想・宗教、日本文學・文化、日本語・教育學、日本政治・經濟、在日韓國人・在韓日本人等六個研究室，主要與東亞及歐美的日本研究機構建立聯絡網或進行學術交流。目前執行「殖民地日本語・日本文學研究」及「東亞同時代的日本文學論壇」兩項計畫，由傳統的「從日本看日本語文學」轉換成「從東亞看日本語文學」，向跨越國境的方向發展，同時考察被殖民的朝鮮時期日本人的文化活動，探討帝國與殖民之間，近代知識的變遷問題，進而促進國際共同研究及成果的出版。淡江大學日文系田世民助理教授介紹目前臺灣各大學推動日本研究的現況及各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成立、研究方向、內容等情形。同時強調未來臺灣的日本研究必須深化人文及社會科學的對話機制，並與東亞各國相關機構進行學際合作的重要性。

（四） 國際共同研究的現況與展望

第四場次由韓國漢陽大學李康民教授擔任主持人，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主任徐一平教授、韓國釜山大學趙垺熙教授、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大學 Dmitri Streltsov 教授、日本帝京大學池村俊郎教授擔任評論人。首先由筆者介紹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推動「日本、韓國研究平臺」的發展情形，進而說明臺灣大學文學院成立「日本研究學程」、日本研究中心，培育年輕研究人才的發展目標，同時介紹出版具有臺灣特色的「日本學研究叢書」之意義與內涵。希望通過相互理解，達到臺灣與國際日本學研究接軌的願景。創價大學守屋三千代教授介紹「國際〈見立て（mitate）〉」國際共同研究計畫的執行情形，指出「見立て」=趨向、思維、思考，它作為研究日本文化的關鍵詞，涵蓋日本人對「見立て」的認知，亦是異文化受容與理解對策的關鍵詞，強調通過相互理解，共構客觀視野的必要性；從探討自文化的獨特性到文化的共有性，確認東亞文化圈的未來性，以及年輕學者參與共同研究的有效性等問題。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郭連友教授從東亞共同人才培育、共同研究的現狀、中日兩國的遠距教學、舉辦年輕日本研究學者論壇等課題，探討該中心發展日本文化、文學、思想領域的現況。



◀ 徐興慶先生（立者）發表〈臺灣日本研究的現況及未來展望〉。

韓國東國大學金煥基教授介紹「南美地區日系、韓系移民文學」共同研究計畫的執行成果。說明該計畫主要目的在探討（1）通過「文學的認知」，確認

Diaspora（離散移民）文學的普遍價值，進而評價它作為世界文學的價值；（2）探索越境國家、領域之間的融合、複合研究的可能性；（3）評析因全球化時代開展的移民文學普遍性問題。最後說明韓國移居海外者超過 700 萬人口，2000 年之後更有快速成長的趨勢，希望能將韓國向多文化社會移行的現象的研究調查結果活用在教育的層面上，並強調未來持續國際共同研究的重要性。

代結語——亞洲四所大學校長對「Asia Paradoxa」

現象的解決之道

前述「Asia Paradoxa」的現象與民族主義及各國國內政治問題相互牽扯，持續在東亞社會發酵，這是歷史問題與相互摩擦所帶來的後遺症，現今的東北亞似乎捲入這個問題的漩渦之中而難以自拔。針對這個問題，亞洲有四所大學校長分別提出了建言。首先他們一致強調為了亞洲的未來，共同體精神的培養是迫切的課題，也透露出東亞各國之間雖然地理位置相近，但互信基礎薄弱，衍生諸多誤解與遺憾，呼籲大家共同省思這個日益嚴重的問題以及解決之道。

東亞各國在全球化的潮流中都在促進對歐洲及中東國家的理解，反而東亞鄰近的國家不能相互理解而紛爭頻繁。對此現象，北京大學王恩哥校長認為大學有必要加強對文化及社會的責任教育，首爾大學吳然天校長則呼籲大家反思國際社會是如何評價東亞社會彼此之間對鄰國的理解度。東京大學濱田純一總長以「亞洲的亞洲化」概念，提示未來亞洲研究的新方向，為了振興區域內的亞洲研究，應該超越國際共同語言——英語的範疇，切實重視亞洲圈的語言教育。舉例而言，日本研究除了日本學者的研究之外，綜合加入外國人，特別是亞洲學者的深度研究，更能確保其高度的客觀性。越南河內大學 Punnsyania 總長則強調各國應該多理解東亞社會的共通點及差異性的問題，而解決之道即是重視及推動各國之間的文化交流。這四所大學對增加留學生、學分的相互承認、超越國境的網路教學以及對亞洲的大學評量基準已經取得共識，他們共商大學原來的本質——研究與人才培育，希望超越目前東亞政治問題的糾葛，為未來亞洲的和平謀求解決之道。

從歷史演進的角度而言，「東亞共同體」的提議，至少已經過了一百年，但都難以達到共識，更遑論付諸實行，也許這是對亞洲人自尊心的錘鍊，關鍵在於如何擺脫狹隘的復古主義及民族主義。通過這次的論壇，集合東亞各國產官學界日本研究學者的不同論述，進行多元性的對話，彼此敞開胸襟，抒發己見，談論之間，大家逐漸捨棄主觀意見而理解他者的想法，縮短了歧見的距離，進而了解到東亞社會「互惠平等」、「合則兩利」原則的重要性。本次會議廣泛連結了東亞日本研究的最新資訊網，深入探討東亞各國日本研究的現況、可能性及未來展望的相關議題，提供大家全新的思考方向，並達到日本研究跨領域、跨國界的整合目標。大會在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清水順一郎長致閉幕詞後圓滿落幕。第五屆「東亞日本研究論壇」預定於 2014 年底在日本東京舉行。



▲ 2013 年 12 月 7-8 日韓國日本學會主辦、日本國際交流基金協辦的第四屆「東亞日本研究論壇」大會合影。